

父母言语暴力对儿童心理与脑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

李常红¹ 胡铨玲² 何绮婷³ 林旅建² 戴丽芬²

¹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510303, 广州)

² (东莞市东坑中学, 523450 东莞)

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510303, 广州)

摘要:

父母言语暴力是指抚养者通过负面语言持续性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由于言语暴力的隐蔽性和测量复杂性等原因, 研究者对其有关机制研究非常有限。借助于多模态脑成像技术, 我们可量化言语暴力如何改变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并影响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利用脑成像技术进行言语暴力的测评、成因分析以及影响机制探索, 尤其前额叶、杏仁核和纹状体等关键脑区。另外, 近红外超扫描技术可帮助我们量化亲子情绪言语交流时神经同步性, 这也是评价干预措施有效性时需要关注的重要生物影像学指标。

关键词: 父母言语暴力, 心理健康, 脑神经机制, 儿童

分类号: TP393

1 引言

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 本质上体现为代际间动态发展的情感联结与心理距离(Bowlby, 1982)。该系统通过持续的情感交互行为调节机制, 在儿童身心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已有众多研究表明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儿童发展出安全的依恋关系、有效情感支持系统和良好社会化技能, 促进毕生心理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Stafford et al., 2016)。父母日常教养行为是塑造亲子关系的主要途径, 即父母在育儿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思维和行为方式, 包括如何与孩子行为互动等。基于Baumrind(1996)的教养风格模型理论基础, 先前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要求/控制、反应性/支持、参与度等)区分不同家庭教养风格及其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Lamborn et al., 1991; Morris et al., 2007)。例如, Pinquart 等人(2017)荟萃分析了1435篇家庭教养风格类型的实证研究后确认权威型教养与儿童的外化问题权之间存在较弱的纵向负相关, 而严厉控制、心理控制、专制、放任和忽视型的教养方式与较高的外化问题水平显著正相关。教养风格中的某些维度体现在日常言语或行为互动中, 因此直接研究亲子沟通过程中存在言语暴力等不良互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言语暴力(verbal abuse)是指抚养者(通常是父母)通过贬损性语言、持续否定或威胁性表达损害儿童自我概念的行为模式(Vissing et al., 1991), 例如辱骂、责怪、讥讽、威胁和大吼大叫等。亲子关系中的言语对话是父母与孩子日常沟通的主要方式, 它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手段, 更是儿童认知观念形成、情感表达、价值观传递和行为指导的来源(Bayly & Bumpus, 2020; Lanjekar et al.,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亲子情绪言谈的脑间活动同步性促进6~12岁儿童共情能力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GD23YXL02)的研究成果之一。

2022)。美国疾病控制和保护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把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虐待和童年忽视作为最常见的儿童虐待类型,这一分类到目前仍受到广泛应用。负面的亲子言语对话模式(如言语暴力)是儿童遭受情感虐待的主要形式之一。言语暴力是一种高发但易被忽视的消极教养方式,已被证实会导致显著的负面心理后果。与躯体虐待相比,这类心理暴力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持续性特征,因此测量起来更具有挑战性。由于言语暴力的研究现状及脑机制方面仍存在理论空白,本文综述旨在探讨父母言语暴力如何通过神经生物学机制影响儿童心理健康,识别针对性干预策略以缓解其负面效应,并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进行建设性展望。

2. 父母言语暴力的主要测量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有效测评工具准确量化父母言语暴力程度是研究其如何影响儿童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的前提。目前学术界仍然主要以传统问卷和访谈等较为主观的方式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如父母行为、儿童反馈或家庭环境调查等。其中,自我报告问卷是测量亲子言语暴力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在大规模横断面研究中,即受访者(通常是儿童或者大学生群体)通过问卷报告他们所经历过的父母言语暴力行为。Teicher 等人(2006)研发了包含 15 个项目的言语暴力量表(The Verbal Abuse Questionnaire, VAQ)来测量几种主要言语暴力成分,如责骂、吼叫、侮辱、嘲笑和批评等。Jeong 等人(2015)将其翻译成韩语后并对大学生施测,发现其信度高达 0.9 并且能够解释 55.34%的总变异。当然,更多的研究者认为言语暴力只是儿童情感虐待形式的其中之一,如 Momtaz 等人(2022)编写的情感虐待量表和蒋奖等人(2010)编写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同时,国内一些心理学研究者(房超, 2003; 杨晓莉 & 邹泓, 2008)也在研发亲子沟通质量的测评问卷时纳入类似的亲子言语交流问题。这些量表对于言语暴力的评估往往包含在情感虐待内,如“父母常常贬低我”、“父母说我是个没用的人”等具体的描述。测量儿童言语暴力程度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他人的报告,尤其是父母报告可以通过自评问卷或访谈报告他们在育儿过程中使用的言语行为反映其是否存在消极教养言语行为。比如,父母-儿童互动量表(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cales)会评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包括父母在互动中的言语是否存在贬低、威胁、侮辱等负面情绪特点(Ip et al., 2018)。Ritchie 和 Fitzpatrick (1990)修改的家庭沟通模式量(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 Inventory, RFCPI)也可以用于亲子沟通的测量,并把家庭中的亲子沟通类型划分成一致型、多元型、保护型和放任型。父母报告可以提供对家庭内部行为的直观反映,但是父母可能低估或否认自己存在言语暴力行为,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文化上对体罚或批评较为宽容。某些情况下,教师或其他监护人的报告也是言语暴力评估的补充来源。但是教师和同伴只能间接反映孩子的情感或行为问题,无法直接揭示言语暴力行为。例如,Glouchkow 等人(2023)使用案例小故事评估教师对不同类型虐待的检测和报告行为。结果显示教师对情绪虐待的检测率和报告率分别达到 86%和 70%,虽然低于性虐待(95%和 93%)和忽视(87%和 75%),但仍表明教师在识别情绪虐待(包括言语暴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言语暴力的隐蔽性往往导致现实生活中的言语暴力的测量需要综合多种评估工具(如自我主观报告、父母报告、行为观察和神经影像评估等)才是获取全面且准确评估的有效途径。作者认为目前针对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大多数测量父母言语暴力行为的量表主要集中在自我报告问卷或父母/教师的主观评估上。这种评估方式存在较大的主

观偏差且难以精确捕捉到言语暴力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对该消极行为的忽视或误判。因此有必要结合多模态脑成像技术(如脑电图、磁共振或近红外光谱成像等)来提供更为客观的生物影像学标记或评价工具。例如, Kinreich 等人(2017)使用基于脑电图(EEG)的超扫描研究父母和青少年在情感体验中的大脑同步,发现父母参与度影响颞叶-顶叶脑区神经活动的同步程度,说明亲子言语沟通质量(如温暖和参与)可能通过该指标来反映。Reindl 等人(2019)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的超扫描技术研究母子在合作任务中的大脑同步,发现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同步与合作成功呈显著正相关,这也可能反映了亲子言语沟通的有效性。但是关于言语暴力在内的父母消极言语行为如何通过亲子大脑活动的神经同步性来反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3. 家庭言语暴力的风险因素与理论解释

导致家庭环境中父母容易出现消极教养言语行为的原因可能是多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合脑成像与行为学技术,有文献发现儿童时期的大脑某些区域(如双侧听觉皮层、颞上回和额下回等)对父母的声音加工会更加敏感,进而影响儿童对情绪刺激强度的感知和沟通技能发展等方面(Abrams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9; Stoop et al., 2020)。因此,儿童个体的某些特征如孩子的大脑、性格和行为差异都会影响对父母消极言语的感知与调控加工。例如,挫折感强、冲动且努力控制能力低的儿童容易出现父母消极言语行为和外化问题的恶性循环,这可能与他们对批评或冷漠言语的敏感性增加有关(Kiff et al., 2011)。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儿童受限于其年龄和发育阶段的因素,如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父母或者自身的言语,其行为不易改变而导致个体遭受言语暴力。

与此同时,家庭层面的父母个人心理与行为特征,如父母大脑神经活动反应也会影响家庭言语暴力出现的可能性(Lavi et al., 2021; Zimmer-Gembeck et al., 2022)。例如, Bartels 和 Zeki(2004)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父母观看自己孩子照片时的,发现大脑与奖励和情感有关脑区(如前扣带回、岛叶、基底节)的神经活动显著激活,这说明父母大脑对亲子关系存在独特反应模式。Swain 等人(2007)回溯了一系列有关父母教养的 fMRI 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对婴儿哭声或面孔的反应涉及下丘脑-中脑-边缘系统-旁边缘系统-皮质神经网络,这可能与亲子情绪、共情和注意等复杂沟通行为相关。一些父母也可能因为异常大脑活动特点导致其情绪调节能力差,容易在亲子冲突中失去冷静而使用激烈的负面语言来对待孩子。先前许多神经影像学研究(Bueso-Izquierdo et al., 2022; Bueso-Izquierdo et al., 2015; Kärger et al., 2017)都发现了家庭暴力施虐者在某些关键脑区上的神经活动或代谢水平紊乱,为我们理解父母的大脑活动如何影响家庭言语暴力的产生提供实证支持。例如, Bueso-Izquierdo 等人(2022)使用 fMRI 结合道德困境测试,发现施虐者在面对涉及家庭暴力的道德困境时无法激活与道德决策相关的脑区(如前额叶皮层),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在道德判断方面的缺陷。他们的子女可能在无意识中复制这种行为模式,转而对待自己的孩子,在日后也成为“施暴者”(Kawabata et al., 2011)。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则认为个体的发展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的环境系统(如家庭、学校、社区等)共同影响的。某些父母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如经济困难、工作压力、婚

姻问题等)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有关,倾向于使用言语暴力等不健康的情绪表达方式来宣泄情绪,导致儿童出现各种内化或外化行为问题(Cohn et al., 2013)。在某些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环境中,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言语暴力的严重性,认为对孩子的言语控制或严厉批评是一种教育手段(Lansford et al., 2005)。在国内,一些父母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相信“严厉教育”是爱的表现,产生“打是亲,骂是爱”的认知观念。研究显示,这种观念可能导致他们忽视言语暴力的长期负面影响,认为孩子需要在“严格”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尤其是深受儒家思想和传统孝道文化影响的家庭(Xu et al., 2019)。当然,言语暴力的产生也受到媒体和网络文化的影响,比如一些暴力、负面的语言通过社交媒体或娱乐内容传播影响家长与孩子的交流方式(Ante-Contreras, 2016; Brock & Kochanska, 2016; Lee et al., 2022; Olpin et al., 2023)。以上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儿童言语暴力的产生和影响,因而采用神经影像学技术时不仅要考虑个体的差异,还要家庭、社会和其他环境因素综合研究。作者认为可进一步结合这些理论模型来分析父母言语暴力行为对孩子心理和大脑的影响,探索如何通过有效干预策略减少言语暴力对儿童的伤害。另外,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国家,而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言语暴力的理解、定义和后果的研究较少,即不同文化中的家庭结构、教育理念和社会期待可能会影响言语暴力的表现形式和孩子的大脑神经活动反应。

4. 言语暴力对儿童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

4.1 认知与心理健康问题

虽然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但是有学者发现遭受早期言语暴力的儿童在语言发展、认知思维和自我评价方面都与正常环境成长的儿童相比表现较差(Grant & Gravestock, 2003; Kochar et al., 2015; Palazón-Carrión & Sala-Roca, 2020; Sylvestre et al., 2016)。例如, Sylvestre 等人(2016)的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遭受言语暴力或情感忽视的儿童在言语技能方面的发展较为迟缓,尤其是年龄小的儿童个体。在认知思维方面,遭受高度言语暴力经历的儿童在注意力和平行加工任务方面的得分低于遭受低度言语暴力的儿童(Kochar et al., 2015)。由于长期的情感创伤和心理压力,遭受言语暴力的儿童可能在学业上表现不佳,而较高水平的父母教育水平、安全感以及愉悦感可能是其保护因素(Mohammed, 2023)。先前大量文献已表明长期遭受父母批评和贬低的儿童可能形成对自我价值的负面认知,进而内化为负面信念导致自尊心严重受损(Solomon & Serres, 1999; Wu et al., 2022)。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可以从儿童时期一直持续到青少年和成年时期(Cheng & Chan, 2024; Litasari et al., 2022)。在自我情绪调节能力方面, Kim 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情感和身体虐待的严重程度与较低的情绪冲突适应能力有关,表明儿童时期的情感和身体虐待可能会导致自动化情绪调节障碍。同时,认知重评在情感虐待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但表达抑制不起作用,这些因素最终可能导致儿童的临床抑郁症状(Li et al., 2022; Sachs-Ericsson et al., 2006; Tian et al., 2023)。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发现童年虐待经历的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说明这种影响是长期持续的(Holmes, 2013; Rizvi & Najam, 2014)。对于一些遭遇严重言语暴力的儿童,他们甚至可能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包括频繁的回忆、噩梦、情感麻木和回避行为等症状(Dube et al., 2023)。

4.2 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化问题

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更通过内部工作模型影响个体终身的社会适应功能(Bretherton & Munholland, 2008)。在依附理论的框架下,如果父母通过言语贬低、批评或威胁孩子导致孩子可能会对父母缺乏信任与安全感,进而影响其与其他人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例如,Neil 等人(2022)的研究使用面孔判断任务时发现遭受虐待的儿童在判断陌生人的可信度时会给予更少的分数。儿童早期情感虐待经历可能导致成年后感到不适于与他人亲近,难以信任和依赖他人,并害怕被拒绝或遗弃(Dye, 2020)。先前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暴力行为与个体的心理虐待和忽视经历密切相关(Auslander et al., 2016; Holmes, 2013; Lake et al., 2015),并且个体心理虐待水平与攻击水平有剂量-效应关系。例如,有过父亲施暴经历的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往往会主动发生暴力语言或行为(Luthra & Gidycz, 2006),这种现象反映出虐待行为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

4.3 生理性改变问题

众多证据表明,父母长期的情感伤害可能导致儿童出现过度的生理应激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等),并持续性地影响个体心血管系统和内分泌系统(Pétrin et al., 2024; Stone et al., 2018)。例如,KEOGH 等人(2022)利用美国中年研究(Mi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 study, MIDUS)的第二波数据库(MIDUS II)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与更加迟钝的收缩压反应性、舒张压反应呈显著关联。Kisely 等人(2023)完成的研究发现那些经历过童年情感虐待的成年人更容易伴随肥胖和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异常等指标。对于免疫系统而言,言语暴力带来的持续心理压力会通过应激反应系统(如皮质醇分泌)能导致儿童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使其更易患上头痛、胃痛、睡眠等各种身体疾病,影响儿童生理健康水平(Carpenter et al., 2009; Schar et al., 2022)。Schar 等人(2022)的元分析结果表明经历儿童虐待的成年个体表现出皮质醇应激反应钝化而其他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活动的测量指标(包括皮质醇日节律、药理学皮质醇水平以及皮质醇分泌累积指标)则不受明显影响。

长期的情感和心理创伤等不良家庭环境可能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是在儿童或青少年阶段大脑尚处在发育的关键时期(Hart & Rubia, 2012; Huang et al., 2024; Tomoda et al., 2011; Zhu et al., 2019)。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发现,7~8岁左右的儿童在听到自己母亲的声音时双侧听觉皮层后部、颞上回以及额下回已经表现出更强的激活反应,反映儿童大脑神经活动对自己父母声音的敏感性(Stoop et al., 2020)。Su 等人(2022)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发现消极的家庭环境会显著降低儿童在大脑腹侧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海马体的被试内功能连接的相关强度,从而加剧儿童的内化症状。先前许多研究证实了长期遭遇虐待的个体在大脑的情感调节和压力反应区域(如杏仁体和前额叶等)可能出现功能连接异常,进而影响其情绪调节和自我调控能力(Gong et al., 2021; Peverill et al., 2019; Yoo et al., 2023)。例如Peverill 等人(2019)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收集了57名青少年情绪调节任务的脑影像数据。他们发现与没有虐待经历的青少年相比,遭受过身体、性或情感虐待的青少年在大脑腹内侧前额叶-杏仁核之间呈现更强的负向功能连接,并且与虐待严重程度正相关。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Jae Hyun Yoo 等人(2023)在一项以41例遭受过早期父母言语攻击的成年人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面对脏话 Stroop 任务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左侧杏仁核海马区域的葡萄糖代谢水平显著升高,进一步发展成抑郁症患者的概率更高。而那些有童年虐待历史的抑郁症患者在面孔匹配任务过

程中呈现额叶-纹状体的负激活模式，说明奖赏系统也出现问题(Nagy et al., 2021)。对于其大脑结构改变来说，Tomoda 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有父母言语暴力历史的成年个体在左侧颞上回的灰质体积显著增加 14.1%，并分别与父母的言语攻击水平呈较强正相关和父母教育呈显著负相关。有人基于扩散张量成像技术发现童年虐待经历和大脑前扣带皮层、弓状束和皮质脊髓束的白质纤维束整合性方面存在显著关联(Choi et al., 2009; Kurata et al., 2024)。例如，Choi 等人(2009)的研究使用扩散张量成像发现，遭受言语暴力的年轻人在与情绪和认知加工有关白质纤维连接上存在异常，这表明言语暴力可能干扰脑区之间结构连接的完整性。

4.4 基因或生化改变问题

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虐待经历可能改变后代基因表达，而不改变 DNA 序列。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经历情感虐待的儿童在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相关的基因中表现出 DNA 甲基化模式的改变，这与应激反应和抑郁风险有关(Lester et al., 2013)。虽然直接针对言语暴力的遗传研究较少，但已有研究探讨了童年期虐待的遗传影响。一项研究发现情感虐待的遗传影响在女性中比男性更显著，这表明某些遗传因素可能使儿童更容易受到言语暴力的影响并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Pezzoli et al., 2019)。从生物化学角度看，研究发现童年期虐待与 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SLC6A4）的甲基化增加相关，这可能降低血清素活性进而导致抑郁症状(Jiang et al., 2019)。虽然直接针对父母言语暴力的遗传和生化研究较少，但现有证据表明言语暴力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变化和生化机制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为理解言语暴力的长期影响提供了重要见解。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家庭环境内部父母言语暴力对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且多集中于特定临床群体，缺乏大规模和代表性的样本研究。尽管已有一些研究表明言语暴力可能影响大脑某些关键脑区的功能和结构（如杏仁体、前额叶皮层和纹状体等），但具体的神经环路及其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路径关系都尚未明确。而且，多数神经影像的研究往往缺乏纵向追踪研究，难以揭示长期言语暴力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累积效应及其可塑性。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年龄发展阶段的子女个体（如婴幼儿、学龄期儿童或青少年群体等）对言语暴力的认知加工偏好和情感调控能力存在差异，但是现有研究缺乏进一步对比。

5. 亲子情绪言语干预与脑机制证据

家庭环境中的亲子情绪言谈可以有助于幼儿获得情绪理解的经验，其中亲子绘本阅读是亲子情绪言谈的主要途径之一。亲子绘本阅读可以促进幼儿对情绪词汇的掌握、提高对不同情绪效价的理解以及掌握合理情绪调节的方法。国内外有关研究(Adrian et al., 2005; Schoppmann et al., 2023; 孟颖 et al., 2024)显示亲子情绪绘本共读的方式可有效培养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例如，王硕(2020)探讨通过共同阅读情绪社会性主题绘本的方式改善幼儿情绪社会性外显域及失调域问题的可行性，研究发现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征的绘本是改善幼儿情绪社会性问题的良好工具，但有关研究主题缺乏来自于脑神经影像学证据的支持。Atzil 等人(2019)的 fMRI 研究发现母亲与婴儿的情感互动（如眼神交流、语调变化）会增强双方前额叶-边缘系统（如杏仁核和伏隔核）的神经同步性，这可能为我们理解亲子共读的脑神经机制提供了证据。同时，Zhou 等人(2023)的一项研究使用自然观影 fMRI 范式发现亲子在情绪网络与其他大脑区域相互作用时神经同

步性越高，青少年的情绪适应能力就越强，包括较少的负面情绪、较低的焦虑水平和更强的自我恢复力。有趣的是，这些关联仅在凝聚力较高的家庭中显著，而在凝聚力较低的家庭中则不显著。Liu 等人(2024)的研究显示，亲子之间的额叶和颞顶交界区在合作任务中同步性增强与沟通质量和情感调节相关。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亲子之间的神经同步性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育(Zhao et al., 2024)，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无创伤性大脑刺激方法（如经颅磁刺激或经颅直流电刺激等）来干预并取得一些显著进展，但尚未有专门针对亲子言语暴力的大脑刺激干预研究。因此，未来如何结合或比较不同策略（如认知行为疗法、情感对话和神经刺激反馈）的有效性及其局限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6.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父母言语暴力对儿童心理健康及大脑发展的影响，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随着脑成像技术的进步和家庭教育研究的深入，未来的研究方向有着广阔的前景。首先，我们需要融合脑成像技术开发多维度、情境化的量表。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发更加全面的评估工具，考虑到言语暴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涵盖不同类型的语言暴力及其不同情境（如家庭、学校等）。这些量表应具备更高的信效度并且得到来自脑成像的实证研究支持，能够准确捕捉父母言语暴力行为的发生频率、强度和影响程度等各个维度。其次，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多中心的纵向神经影像研究，探索言语暴力对大脑某些特定脑区的长期影响（如杏仁核-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动态改变），特别是儿童大脑发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影响。例如，左西年教授开展的绘制中国学龄儿童脑与行为生长曲线的大型实验项目-“中国彩巢计划”(Fan et al., 2023)。同时，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言语暴力的表现形式、评估标准以及其对儿童心理和大脑的影响。例如，东亚文化中尊重长辈和家庭和谐的观念可能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养行为，以及孩子对言语暴力的感知和反应。基于此特点，需开发和使用文化适配的测量工具，确保对言语暴力的准确评估，并能够反映不同文化对言语暴力的不同认知和反应方式。最后，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技术探索父母言语暴力的应用也应该引起重视，例如国内华东师范大学研发了“知心慧语”小程序。AI 可以识别和分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对话，特别是语言中的负面情感和虐待性话语。AI 的语料库可以用来研究父母言语暴力的语言模式与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大量的对话数据分析帮助我们理解言语暴力的发生规律、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干预。当然也需要克服技术、伦理和隐私等方面的挑战，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保护提供支持。

尽管关于父母言语暴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评估工具、大规模的神经影像研究、跨文化比较以及纵向的追踪研究，深入探索言语暴力对儿童心理和大脑健康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更加全面和科学的依据。

The Impact of Parental Verbal Abuse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 Neurob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nghong Li¹ Quanling Hu² Yingchun Han¹ Qiting He³ Lvjian Lin² Lifen Dai²

¹(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510303, Guangzhou)

² (Dongkeng Middle School, 523450 Dongguan)

³(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510303, Guangzhou)

Abstract:

Parental verbal abuse is defined as a common yet often neglected form of emotional abuse within family setting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having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s o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measuring parental verbal abuse behaviors, researchers still hav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its causes and the mechanisms related to its psychological health consequences. By integrating multimodal brain imaging techniques,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neurobiological evidence of how parental verbal abuse develops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certain key brain regions (such as the prefrontal cortex, amygdala, and striatum). Additionally,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can help us quantify the neural synchrony during parent-child emotional verbal interactions, which is also a biological imaging indicator that needs special attention when implement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words: Parental verbal abuse, mental health, neural mechanism, children